

一 我的留学记

留学之前

把中国作为中国来理解

先生最初虽然是在入大学前就到上海旅游过一个月，作为留学生在北京，则是在 1928 年即昭和三年先生 25 岁的春天，到 1931 年即昭和六年先生 28 岁的春天这三年间，留学结束后，又往江南转了一圈，然后回国。这期间所接触到的民国初年学界的情况，在北京的所见所闻等，如能给我们后生讲讲，将是十分有益的事。今天获得这一机会，想先请先生谈谈留学之前的情况，即先生是怎样与中国文学结缘的，留学之前日本学界的有关状况等等。首先从为什么要去中国留学谈起吧。

那时的京都大学文学部有三种讲座，持续至今仍是这样，即中国哲学史、中国语学·中国文学以及东洋史学，这三个讲座也可叫三个学科。这三个学科毕业的学生，原则上都必须到中国去留学。

因为这三个学科的毕业生很少，所以都去留学，首先有这种可能性。其次，做中国的学问不可以从来未去过中国。这在最近以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河野所长为团长的中国访问团一行在中国的座谈会上的讲话，也有所反映，据朝日新闻社刊出的座谈会记录《中国纪行 30 日》中，岛田虔次君有十分恰当的论说。他说京都的中国学是以与中国人相同的思考方法、与中国人相同的感受方式来理解中国为基本学风的。为此，如果不去中国留学就不可能做好中国的学问，这已成了一种规则。我是 1923 年即大正十二年入京都大学中国文学科的，1926 年即大正十五年毕业。毕业后去中国是既定的计划中的事，所以说，留学在那时是普通的事情。

当时，许多人能去中国留学，还因为大学里有某某人的基金。如上野奖学金，不是朝日新闻社的那个上野，而是京都的一个很有

钱的上野，他在大学校方存了值当时钱的十万元，用这笔钱的利息正好可经常供一到二人到中国——主要是北京去留学，我就是得了此项奖学金而去中国的，在我之前有佐藤广治君，在我之后有木村英一君、小川环树君。此外，还有得文部省奖学金去留学的，在我之前有小岛祐马，与我同时有仓石武四郎。还有靠东亚考古学会的基金去中国的，如出身于京都大学，最近刚去世的水野清一君、如田村富造君。

所以说，在当时，做中国学问的人留学不是什么特殊的事。东京大学方面的情况，我不是十分熟悉，但也有增田涉君、松枝茂夫君等人，自费去中国留学的。

京都的学风是取与中国人相同的思考方法，这种研究的基本态度，在当时的日本中国学中，处于怎样的位置？

这种治学态度的中心人物是狩野直喜、内藤湖南两先生。两位先生采取这样的治学态度是对江户汉学的反叛。江户时代的汉学是把中国作日本式的解释。其原因从消极方面说，是因为锁国，没办法；从积极方面说，江户时代的汉学是一种民族主义的东西。但总之，江户汉学并不真正懂得中国。把中国作为中国来理解，必须是一种新的学问。这两位先生都是生于明治前后，成长于明治中叶，那时的日本学术界，在广泛的意义上，有一种历史学的倾向，即对已认识的事物进行再认识，两位先生就是在这样的学风中成长起来的。任何现象都必须追寻它存在的根本原因，虽然并不好说他们自己意识到多少，但先生们学问的根基即基于此，是没问题的。

另一方面的原因，在现在几乎被人们遗忘了，即京都大学一开始，就是本着与东京大学不同的学风而开办的。特别是文学部。最初设置京都大学的理由之一，就是当时日本只有一所大学，易流于独断专行，必须营造一个它的竞争者，这是政府方面的意思。当时政府方面有以西园寺公望为中心的主张者，而民间方面强烈主



内藤湖南先生

张的无疑是内藤湖南先生。如果看了筑摩书房的《内藤湖南全集》，就能知道，当时先生在大阪朝日新闻社工作，主张必须在关西

建立一所大学以与东京大学抗衡。此外，在内藤湖南先生，正如刚才所说，他是想纠正江户时代汉学的不正学风的，而这在东京大学的汉学科中并没有充分的体现，所以，先生在来京都大学前十分强调这一点。

所以，京都大学文学部，在任何方面似乎都是本着与东京大学不同的方向来进行学问研究的。另一表现是，如西洋文学，东京大学当时是聘用外国人教师的，开始时全部是外国人教师，后来渐渐增加日本人教师。但是在京都大学开办的明治三十年代，东京大学还留存着外国人教师，而京都大学外国文学就一个外国人也没聘用，全部由日本人自己担任，如藤代祯辅、上田敏等。如西田几多郎的哲学，也是在反对东京大学井上哲次郎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活力的一个哲学流派。在中国学方面，这种倾向十分强烈，像我们这班人，就是在不要输给东京大学的意气中成长起来的。

在尊重西欧的风潮中

但那时，有盐谷温到湖南长沙，并与叶德辉接触之事。这是东京大学的新倾向，是否意味着东京大学有什么新的消息？

不，作为留学生到中国，也是狩野直喜先生为早，他比盐谷温要早 10 年。作为文部省留学生到中国的，最早有两人，一是东京大学的服部宇之吉，一是狩野先生。义和团是在 1900 年吧就是在这一年，他们去的中国北京，一到那里，正赶上北京笼城^①。这在服部宇之吉的《北京笼城日记》一书中有详细记载，他们两人与后来成为中国文学研究家的古城贞吉，当时是新闻记者，都被包围在东交民巷的日本公使馆内。这就是文部省向中国派遣的最早的留学生。此后，才有成为大学助教授的人，可以由文部省派遣去中

^① 笼城：指因被敌人包围，困陷于城中的情况。

国留学。

在满铁有有薪休假让你去留学的制度，伊藤武雄要求去中国留学，被反问说为什么要去中国，去欧洲不很好吗？经再三要求，他才去了中国，并见到了刘少奇等当时的那些年轻人。这是我们从伊藤武雄那里听到的。京都大学把去中国留学制度化，这在当时的日本是非常罕见的吧。

从日本全体来看，多少是有点特殊性。原来搞中国学研究的人，也并非一定要去中国留学，早期的中国学者，如最近去世的宇野哲人比我大 30 岁左右，当时是东京大学的助教授，受文部省之命去中国和德国留学。京都方面，在我的前辈中，有京都大学助教授小岛祐马去法国和中国留学，那是在我留学之前不久。还有羽田亨君也是在我留学之前不久，去英国和法国留学。为什么要去英国和法国呢？是因为那里有敦煌文书。那是在 1900 年在甘肃省的敦煌古洞窟中，发现了中国语以及其它西域语言书写的古文文献。这些东西的发现者是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他们把这些文献带回了不列颠博物馆和法国国民图书馆。为了能看到这些资料，许多人到欧洲去。如矢吹庆辉就是其中之一。如羽田亨、小岛祐马在我之前去欧洲，大多数人都是为了调查敦煌文献资料，只有小岛祐马，认为光做敦煌文献没意思，他还收集了魁奈重农主义学派的文献，另外，小岛还是一位对马克思主义有兴趣的人，也收集了一些这方面的文献吧。

另有仓石武二郎，当时是京都大学的助教授，由文部省派遣去中国留学，正好与我同一时期，我与他曾一起寄住在中国的某家大宅中。出发前，他去文部省，文部省的工作人员问：为什么不去欧洲？还有令仓石武二郎愤慨的是：文部省发给的去中国的留学费用要比去欧洲的留学费用少。这事就像是一个象征：在我的学生时代，即大正时代，是日本人对中国最不怀敬意的时期。我本人的决定研究中国学问，多少也是对这种时代风潮的反叛，这我曾在什

么地方写过。

京都学界与清末古典学者的接触

所谓像中国人那样去思考问题，是指怎样的中国人？学者？民众？

是学者。

我大学毕业是在大正末期，去北京是在昭和初期，1930年前后。在那时，如现在所说的现代文学研究那样的东西，在日本是几乎没有的。比竹内好创办《中国文学》杂志也要早。首先，选取研究对象是鲁迅、俞平伯、胡适还有谁呢？陈独秀。总之是《新青年》的人，全部是这些人。最早注意这些人的是青木正儿。青木在《中国学》杂志上介绍中国的文学革命是1920年那是我入三高的那年，我记得很清楚。

因此，现代文学在那时是刚刚开始，一般所谓的学问，就是古典的学问。因此，以上说的是像中国的古典学者那样思考。始创与清末的古典学者一样思考学问的学风的，是狩野直喜、内藤湖南两先生。他们两人与中国清末学者有十分亲密的联系，是很好的朋友，如同事一样地一起研究学问。与他们最要好的朋友，在古典学者中也是属保守派的如罗振玉、王国维、董康还有内藤湖南在《燕山楚水》中记载的人们，与他们的交往开始于明治三十年代。狩野直喜是在留学时期，内藤湖南是在作为新闻记者访问中国时。

辛亥革命后，罗振玉、王国维、董康亡命来到日本。选择京都作为亡命地也是因为了狩野直喜、内藤湖南的友情来日本后两位先生也给予他们非常好的照顾。现在活着的人当中，很了解这些事的人是梅原末治氏。此外，还有神田喜一郎，当时虽还是孩

三高：设在京都的第三高等学校的简称。日本的高等学校相当于中国的高中。三高在当时很有名，毕业生大多入京都大学。



罗振玉与王国维于日本京都

子，但是个早慧的人，他的祖父是汉诗人神田香岩，与罗振玉有交往，这在筑摩书房出版的《敦煌学五十年》中，有所记载，可见他对当时的事也是有所知道的。罗振玉此人，在日本，把中国古籍作照相珂罗版出版，包括敦煌发现的文献。珂罗版的技术在当时的中国还很有限。负责照相的是当时的小林忠治郎，现在也已去世了，他的名字在董康的《刘梦得文集》的跋文中有记载。此外，还有一个叫原田梧郎的古董商，现在还活着，在大阪，他也是知道当时事的人。

罗振玉住的房子，现在我还知道。当然，当时我还是神戸小学

校里的学生，并不能直接知道，也是听谁说的，这是罗振玉的家。我曾经带小南一郎去过那房子前，还照过像。在净土寺马场町高田三郎君家的附近。王国维住的房子在百万遍^①。由于电车道路的扩建，遗址已没有了。剑桥大学的霍克斯先生来京都时，曾经问，王国维当年的住处遗址上，有没有建有什么标志？使我不禁有些惭愧。顺便说一下，董康的住处在现在的吉田山上的吉田山庄。

与从中国来的留学生交往

从中国来的留学生在 1900 年以后那 10 年间非常之多 这些人在京都，主要在什么学校学习呢？或者，先生与这些人有什么交往？

回答之前，我首先要确认，中国人大量来日本是在什么时候？日俄战争前后吧。

就是呀，那正是我出生前后，我出生于日俄战争之时。留学生取缔条约出台，大量中国人愤慨回国是哪一年？

1905 年（补记——1905 年 12 月，陈天华在大森海岸蹈海自杀 留学生中因所谓‘留学生取缔规则’而愤慨回国的很多。）

那时，大概有几万留学生在东京吧。

据说是一万左右吧。（补记——1906 年，明治三十九年达 1 万。）

关于那时的记录有《留东外史》。总之，那时的中国留学生之事，我也是作为历史了解的，并不十分清楚。我的学生时代时，中国留学生的数量已大大减少，主要原因是大正时代是日本人对中国蔑视到了绝顶，或者说是处于低谷，与此相伴，中国方面对日本的感情也非常的不好。所谓排日运动到了顶点。因此，来日本

^① 净土寺马场町、百万遍：均为京都市京都大学附近，地名。

的中国留学生骤然减少了许多。但我在京都第三高等学校——即三高时 还是有两人。一人是王大均 湖南人 另一人 姓李 两人现在也许还都活着。我当时是旧制高校中的文科甲班，从那时起就有要以中国研究作为志向的意识，与他们两人，特别是王君交往颇多。他们两人也把我看作日本人中少有的对中国学生友好的人吧。从当时日本的整体来看，对中国怀有好感的人，也是十分特殊的。不像现在这样，有这么多人对中国有兴趣。（笑）他们对我也很有好感，特别是他们是外国人，上课记笔记还记不全。所以，我的笔记在一下课后，就被他俩借走了，而不可能留在我手中。所以说，从三高开始，我就与留学生交上了朋友。但我的中国语的最初的先生，不是他们两人，而是高等工艺专科学校即今天工艺纤维大学的前身的留学生张景桓君。这是受到了青木正儿先生的关照。我从三高时代就常去青木先生家拜访，那时，青木先生就对我说用训读读汉文是不行的，最理想的是应该用中国音来读中国语，如果这比较困难的话，也应该用汉音来直读汉文。这主张写在他参与主办的《中国学》杂志上。我认为以其汉音直读，不如直接去学中国语发音。但在当时的京都，完全没有教中国语的机构。因此，我把想学中国语，又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的事与青木先生商量了。当时，有一个叫小笹喜三的人常拜访青木先生，他那时是个西洋画家，现在成了书法大家了，并主持阳明文库的工作。那时，小笹君为了学习中国语，正到高等工艺的一个留学生处去学习，于是，青木先生就介绍我也一道去就学。这就是张景桓。所以，我从三高时起就开始跟张景桓学习中国语。虽说是跟他学习，由于都是青年学生，所以，同时也平等交游，成为了朋友。当时中国语的初级教科书是《急就篇》几乎是惟一的教科书，一本小小的 白色封面的书。常常是让他念给我听，我学他的发音。当时学的中国语，与现在流行的有很大的不一样，几乎全是商业用语。是为外交或贸易服务的。我想学的适合于文学的现代中国语教科书是没有的。

没有办法 就只好跟着张君读《急就篇》。张君的寄宿处 或许现在还在，也是在百万遍附近，是一个叫汤浅的巡警家的二楼，我就与小笹君一起 常去那里读《急就篇》。张君看到《急就篇》的书 笑着说“真奇怪”。书的一开始是“来了么 来了。”其次是“走了么 走了。”如此学习一小时后，就一起出去吃饭。就在百万遍拐角处的一家不甚洁净的中国料理小店中吃饭。刚才说到留学生的人数的话题，在京都，就是京都大学和高等工艺两所学校的留学生，全部加起来 大概不到 50人，有 30~40人吧。所以，这家中国料理小店 几乎就是为这些人开设的。后来，它渐渐发展、壮大 就成为今天的“桃园亭”。或者说，它是今天“桃园亭”的滥觞，早先的名字叫东海楼，还是叫东来楼什么的。我不仅在学习中国语的那天，在平时，也常跟张君一起来这里吃饭。留学生很多，只有我一个日本人。他们好像在说先生们的习性什么的，或别的什么，我都听不懂。最初的时候，只觉得他们谁都常说“浪个 浪个”嘴角泛着唾沫，说什么都加上“浪个 浪个”。我有一次问张君：“浪个 浪个”是什么意思，张君说：“什么“浪个”我们没说呀？”我说不，你们大家都习惯地说着的“浪个 浪个”。张君这才明白，呀，是“那个”啊。大家大笑。原来，中国语中常夹进这个并无意义的“那个、那个”。有意思的是，我就在这样什么都听不懂的过程中，进入了中国语的节奏和语感中。所以，首先就学会了中国语的语感。到今天，我的中国语发音语感较好，就是在那个时候打下的基础。就这样，我大约每周三次去他那里，在那样的中国语环境中熏陶。《急就篇》一个月左右就读完了。接下来，读《红楼梦》。

但是，当时的日本人，对中国是抱有多么的轻侮之见呀，我在三高的友人中就有人责问我：你学这东西作什么？其中只有一人支持我，他就是同在文科甲班的中野好夫君。

张君是北京人吗？

是纯粹的北京人。

另二人呢？

王君是湖南人，李君好像是东北人。

留学生之间，互相说的是标准语吗？

不，是各地的方言，我就更不懂了。只知道他们是在说中国语。(笑)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来这里的留学生们与日本人之间，也几乎没有交流吗？

好像是没有。虽然我们班上的人对留学生还是友好的，但像我这样，可以说是特殊的学生吧。

创造社的郑伯奇之人，比吉川先生年级稍晚一些吧。

郑伯奇是法文的，文科丙班吧。

他把三高时代的留学生活写进了小说，说当时的汉文老师对中国留学生骂道：“你是猪。”这有点让人不能相信，大概是郑伯奇的虚构吧。是郑伯奇感受到了那种虽没有说出口，但确实存在的一般性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中，也没准会出现那样的骂人的事。

那小说当然本身就是虚构的。我入学时，三高的汉文先生是山内晋卿和福永亨吉二位，他们是决不可能骂那样的话的。但当时日本对中国的一般态度，或许是能让留学生感受到那种挨骂的感觉的。

被中国文学的“日常性”所吸引

听您这么说来，在接受狩野直喜、内藤湖南两先生之教前，吉川先生已经初步形成了对中国的爱好。

是的。正因为喜爱中国，才进了京都大学的中国文学科。至于说到为什么喜欢起中国来，说不清楚。好像是命运的安排一样。我从一开始就喜欢中国。这是为什么，实在说不清楚。

形成研究中国文学志向的明确动机是什么呢？

现在想来，大概是因为喜欢中国文学的“日常性”这一点吧。在中学时代，我就对汉文十分喜欢，并且还自己写过什么文章，这说起来好像是十分遥远的事了。那时的孩子比现在的孩子，反而更有机会接触外国文学。所以这么说，是根据我自己的经历。

我生于明治末年，入小学时，正好是大正时代。那时候小孩子的读物，主要是岩谷小波写的《日本伽嘶》，《世界伽嘶》^①之类的书。这些书，一部分自己买了，一部分到图书馆去借阅。还有一种不知是哪个书店出版的，把西洋故事写成日语的 20 册的系列丛书，我也读过。当时，一般孩子间流行的是《立川文库》。这你们都是知道的吧。猿飞佐助呀、三好清海入道呀，是十分活跃的作家。在小学校中十分受人欢迎。我在当时就有点非同一般，认为那些东西有什么意思呢？就不太读它。而读为孩子们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这样，念完了小学进入中学，读什么书呢？首先是从《西游记》开始 然后是《通俗三国志》、《水浒传》 然后进入《有朋堂文库》。这比起上述那些东西，是比较高级一些的儿童读物。桑原武夫君也爱读这些，《有朋堂文库》的热心读者还有小川家兄弟：汤川秀树、小川环树无疑是最热心的读者。《有朋堂文库》现在应叫什么呢？就像平凡社的百科辞典那样，是中产阶级家中的常备读物。那时，我也在《有朋堂文库》中读到过《南总里见八犬传》也感到没有什么意思。与《有朋堂文库》中的《新编水浒画传》相比，总觉得马琴^②的作品奇奇怪怪的，很不融洽的感觉。

所以，从中学开始，我就学习汉文了，十分有兴趣。不知为什么，我的中学时代，并没有教过我们《论语》。我是在人大学后，在还不知道《论语》是一本写什么的书的情况下，开始读《论语》的。中学的汉文教科书是相当于《史记》选粹那样的书，十分有趣。那

伽嘶：日语汉字词汇。原意是逐日为君主进讲。这里指每日一篇的儿童故事。

马琴：即曲亭马琴（1767~1848年），小说家，一生作有 300 多部小说，主要为历史演义小说。如《南总里见八犬传》等。

时 早稻田出版了《史记国字解》 我是在中学快结束时 买到这书而读的。就是从这时开始，与西洋文学相比，我更为中国文学的现实性、日常性所吸引。这种感觉到现在仍然不变。此外，当时的许多人都对中国抱有轻侮的态度，我对此感到义愤，也是原因吧。

中学时代，有中国人吗？

我是在神户念的中学，没有中国人。但有听中国话的机会。我是在神户长大的，只要到神户南京街，就能听到中国话。当然，意思听不懂，但它的语调我是在小时候就开始听到了。那是广东话、福建语吧。

在三高时，有哪些先生呢？

刚入校时，有上了年纪的福永亨吉先生。他不是个有趣的人，教了什么也忘了。只记得学的是他编的课本。

在高等学校二年级到三年级之时，遇上三高的所谓“校长排斥运动”。为了驱逐校长金子铨太郎而举行罢课，全校学生停学一周，在当时，是一件大事。这时，有很多老师都被辞职了。后来的是佐藤广治君 他教《荀子》 但似乎也不太有意思。但在三年级时，来了京都大学的教授铃木虎雄先生，那年他还是讲师，来三高教课。这是三高的汉文教学得到强化的原因吧。铃木先生几乎不到别的学校兼课，只特别到三高教一年。教我们读《清文评注读本》 这是文学作品 而汉文竟是可以这样仔细分析、阅读的 通过铃木先生的课，我第一次感受到，并且也因此感受到文章背后如此细腻的心理感情，很是吃惊。但当时的三高，聚集着一批不良少年，这我好像在什么回忆文章中写过，有一次，为了反对老师的教课，班上全体同学都逃到吉田山上去避风。引起了先生的不满，说三高这样的地方再也不能来授课。为此，校长专门向先生道歉谢罪。（笑）因此，最初接受汉文阅读法教育的是铃木虎雄先生。当时，京大中国文学讲座的两位教授，就是狩野直喜、铃木虎雄。

跟留学生学习北京话发音和跟铃木先生学习细读清代文章，

哪个在先？

几乎同时。我是在三高进入三年级稍稍前一些时候，开始去张景桓处学习的。大正十二年三月高校毕业，所以，应该是大正十一年春开始跟张景桓学习的，学了一年左右，第一次去了中国旅行。

这就是大正十二年春 利用人大学前的春假 到上海、苏州、杭州旅游了 20 多天。用四五个月学来的中国语，能够在中国土地上用作实际交流，我十分地高兴。我还记得我说的第一句中国话。我那时开始已渐渐有了吸烟的习惯，此后，一直吸了 50 年的烟 最近被医生告诫要禁烟。在上海，一上岸从码头往上走，在露天的小店中 看到一种牌子的洋烟 现在也还仍有卖的 是那种 50 支一罐装的铁壳子。在当时的日本，卖得很贵。我看到那店里的这烟，就问：“多少钱？”对方回答了我。我的中国语竟能交流了，十分高兴。在上海时，我受到在那里的叔父的照顾。此后，在苏州、杭州、镇江、南京全部是一个人旅行。一个人的旅行虽然是简单的旅行，但总之四五个月学来的中国语足够派上了用场，十分高兴。

去青木先生那里请教，是因了什么缘由？

那是因为读了青木先生发表在《中国学》杂志上的论文。那篇文章与在此之前流行的汉学十分地不一样。我是大正九年九月入三高的，在此之前的高等学校的开学是在每年九月，我是九月开学学制的最后一批学生。正是在这一年的这一月，《中国学》创刊了，并登载了青木正儿的《以胡适为中心的文学革命》一文。我不知怎么就买了那杂志，也许是偶然的。

是个人买的吗？

是个人买的。这是一份月刊，是由青木正儿、小岛祐马、本田成之三人为主创办的，这三人几乎在每一期上都发文章。小岛和本田的文章较难，我看不懂，青木的文章我每期都看，令我佩服的是他把文学比喻成音乐来论述的论文，叫《和声艺术和旋律艺术》，

他认为中国文学的旋律艺术十分发达，但和声显得单调。我读了这论文，深感佩服。于是，我给青木先生写了封信，表示想与先生求见一面，那是刚进入三高二年级时，即大正十年初夏吧。当然，先生接受了我的请见，我跟青木的相见，或许就成为我有志于中国文学的更大的原因吧。

提出“用训读读汉文是不行的，”最初就是青木先生吧？

是青木先生最初在论文中提出的。但我们这般人也有这样的想法。或者说感觉到有这必要。我读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等人的《中国游记》这些先生们自然不会说中国语，但却让人感受到中国语世界的语音美感，而佐藤春夫的什么小说中在出现的“顺风”这样的汉字旁，标上日语注音，也很有魅力。这就像把美国电影中出现的女演员的名字叫做安娜、玛丽一样，说中国语也要发音口唇一样。所以，我在高等学校时代跟张君学习之前，就有对直接说中国语的憧憬。

这方面，内藤先生和狩野先生怎么看呢？

狩野先生是会中国语的，应该是发实际的中国音吧。但老先生们一般对青木先生的这一理论，不能立即就赞成。内藤先生也是这样。还有小岛祐马君也是反对的。这种反对持续了很长时间，到现在有些地方仍存在。

反对的理由是什么？

从理论上说是赞成的，但对一般学生都要求中国语直读，认为太困难，不现实。我本人也未就此与先生们交谈过，只是自己想实践直读。

清朝的学问和欧洲近代的思想

刚才您说到内藤先生与狩野先生对江户汉学的反叛，他们与